

关注当下的民俗学

叶涛

2021年春节假期，中国民俗学会作为学术支持单位，参与了“支付宝集福”活动，与支付宝一起寻找生活的仪式感，尝试让传统年俗融入当代生活的新方式。支付宝集福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形式，突出“福”“红包”“吉祥语”等经典春节文化符号，在营造喜庆浓郁的节日氛围的同时，搭建网络时代全民皆可参与的新型社交场景，丰富了大众对传统福文化的认识。

“支付宝集福”活动自2016年诞生至今，作为数字时代网络新民俗的代表，每年吸引逾亿用户参与其中。今年的活动充分发挥民俗学者参与策划的优势，以“百福齐聚年更欢”为主题，将集福活动从福文化进一步拓展到年俗文化：通过选取全国34个省市中区域性色彩鲜明、展现当地社会生活的年俗，如上海的元宝鱼、天津的贴年画、河南的踩岁、江西的进青果茶、杭州的运河灯会等，使传统年俗以崭新的呈现形式和表达体系回归到当代民众的视野当中，对于传播春节民俗知识、增强区域文化的理解都有促进作用。

民俗学关注“支付宝集福”活动，民俗学者参与网络新民俗的内容策划，这与民俗学留给普通大众的关注



文化强国建设

民国京剧史料建设的开创性探索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评介

王艺珍

民国时期，京剧以其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质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的狂热追捧，逐渐成为全国最受瞩目的剧种。与之相应，关于京剧的批评著述层出不穷，特别是新旧派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这一时期的理论话语建构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盛况。然而，这批庞杂、多元的剧评史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21世纪以来，《民国京剧史料丛书》《中国京剧史料编年：1740—1949》等著作做了一些努力，但对史料撷萃取舍仍有遗漏，缺少对专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

2019年由傅谨主编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以下简称汇编），无疑是民国京剧文献整理的开创性探索。面对体量宏丰的文献史料，汇编另辟蹊径，将力量集中在民国时期京剧批评专书的搜集上。以专著整理为起步，显见编者瞻顾全局的眼光。民国时期的京剧评述活动异常活跃，理论成果十分丰硕、庞杂，不管是报刊资料还是专书、日记，任何一类史料的整理都是浩大、艰巨的工程。而报刊资料经大数据库的成功开发，容易获取，相比之下，论述较为完备、更具理论价值的专书因散见于各大图书馆，给京剧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汇编勤力蒐集亟待整理的专书文献，具有突出的优点和重要的学

术价值。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汇编虽纯粹以专书为搜集对象，但能广采博收，较为全面地囊括了民国时期京剧成熟及至鼎盛、衰落各个阶段的专书理论成果，极大地填补了民国时期京剧文献史料整理的空白。在体量上，搜集各地图书馆的珍贵藏书甚至藏诸海外的孤本，加以整理、考证，共收录1912—1949年之间有关京剧史料的专书120余部。这些著述内容涵盖京剧理论总结、剧目介绍与归纳、伶人生平艺事与京剧风俗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京剧由成熟至鼎盛以至衰落的发展动态，是了解民国京剧学建构的不可忽视的第一手资料。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百余部的著述中，有不少专书此前几乎未被学界挖掘和使用过，此次经过整理才得以重新面世。比如第一册中收录石田太郎所著的《李春来》（小说旬报馆发行，1915年前后）流传极少，目前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鲜为人知，为我们直观窥见京剧演员在民国时期经济地位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

其次，汇编对专书出版时间严格考索追溯，并以为之顺序加以编排，历时性地展示京剧发展流变的历史以及京剧学理论建构的动态。汇编在搜集、整理文献上，能做到“史”“论”互见，既以时间线性展示、呈

受到排斥。在我国2008年之前的法定假日中，除春节之外，其余的传统节日都没有被列入。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的内涵越来越引起重视。特别是在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和中外文化的大交融，深度挖掘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信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民俗学者充分发挥学科优势，顺应社会需求，主动参与到节日和法定假日体系研究之中，为将传统节日列入国家假日体系建言献策。

2004年下半年，中国民俗学会受中央文明办的委托，完成了《中国传统节日体系研究》的专项课题。随后，2005年6月17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民政部、教育部五部委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意见》。中国民俗学会还连续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对岁时节日民俗和假日体系进行专题研讨。2005年召开的“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有来自海内外的50余位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参加会议，就东西方不同社会的文化时间观念、传统节日和法定假日进行深入讨论。有报道说，中外多学科学者共聚一堂集中研讨人类的节日文化，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第一次。2006年召开的“中华民族新年的庆典与习俗研讨会”，则是对以新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及其习俗进行全面探讨。

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受文化部及国家发改委的委托，中国民俗学会完成了“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论证工作。该课题着重论证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

民族传统节日的“起源与流变”“内涵与功能”“象征符号”“节日符号”等，针对节假日体系改革问题提出了建议。论证成果随后结集为《中国传统节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正式出版。

2007年12月，备受社会关注的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由国务院正式颁布，除原有的春节，又增加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传统节日。国家发改委负责人随后就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的有关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2007年以来，文化部和有关高校就我国传统节日的内涵和意义开展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我国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演变历史、风俗变化、节庆活动等。同时，国家民委还就我国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及放假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

传统节日被列入国家法定假日，符合民意，顺应民心，这是关系到全体民众生活的大事，也是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性行为。民俗学家在将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假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民俗学关注当下、参与社会的最好的注脚。

在数字化网络时代全面到来的今天，在新冠肺炎疫情依旧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传统的常规工作方式和日常人际交往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这对所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形势下，民俗学将深入挖掘和继承学术传统，在理论创新和方法探索方面勇于尝试，关注当下、关注生活，在提升全社会的文明水平、满足民众的社会需求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文化强国建设。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会长）

资料、日记等其他类别的文献整理之可能性。将其他类型的文献史料辑录成书，真正完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的整理，京剧学的理论建构和历史脉络的梳理才能更为深刻、客观、可信。值得指出的是，汇编的编纂体例赅续《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专书类的编排。在时间断限上，明确以民国为断代，能帮助读者迅速定位汇编文献的时间范围。除此之外，在每部专书正文前都设有提要小短文，对专书的出版时间、过程和版本都进行简略地考证，并对文献的内容、意义进行简单阐述，这对于读者迅速了解文献相关情况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此外，汇编顺应新时代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习惯，以横排简体替代竖向排列的繁体编排，便于现代读者阅读，极大地凸显了汇编作为资料导引的便利性。

可以想象，要从民国繁篇巨帙的论述成果中爬罗剔抉出相关的文献史料，并形成体系严整的丛书，其工程不可不谓浩大、艰难，而这之中也难以避免会出现一些纰漏和待改进之处。比如，从著者群体来讲，汇编主要收录的是民国现存的研究著述，而对于这一时期的海外京剧研究者著述的收集则较少。白璧微瑕，不掩其光芒。这些遗憾之处，丝毫不会影响汇编在京剧文献史上的重要地位。

总体而言，这部从书竭力蒐集、旁搜远绍，发掘、整理了多部此前鲜为人知的京剧文献专书，开创了民国京剧史料整理之先河，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京剧理论之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毫无疑问，汇编将会成为当代乃至未来几代学者的重要参考书。在此，我们同时殷切地期盼其他类型（报刊资料、日记等等）的民国史料能得到更为全面的蒐集和整理，从而进一步推动京剧学体系之建构。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配以40余件（套）辅助展品、约170幅图片和多媒体设施。其中还有数十件馆藏一级品，包含极少展出的宋《中兴四将图》、明益庄王妃首饰、定陵出土首饰、清《皇朝礼器图》、康熙帝朝服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大量直接表现古代服饰形制的实物，本次展览还绘制了大量线图、制作了15尊不同时代的服饰复原人像，力求完整呈现中国古代衣冠配饰的整体形象，充分展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灿烂成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立体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简史。观众不仅能对不同历史时期古代服饰形制留下印象，也能在了解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基本脉络、重大转折等服饰文化背景知识的基础上，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在继承传统与交流互鉴中不断发展的历史经验，更加坚定文化自信。（谢颖）



王杰

《命子迁》：没有它就没有《史记》

《命子迁》是司马谈的家训。司马谈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司马谈的家训《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为什么呢？

司马谈（约前165年—前110年）是西汉史学家，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向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向易学家杨何学习《周易》，并对黄老之学进行过深入钻研。学习这些知识，为他以后担任太史令打下了坚实基础。

司马谈早年立志撰写一部通史，他在任太史令时接触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广泛涉猎了各种资料。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他随同汉武帝赴泰山封禅，途中身染重病，不久就去世了。在弥留之际，他对赶来探望的儿子司马迁谆谆嘱咐，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志，完成史书的写作。

这就是《命子迁》的由来。那么，司马谈究竟在这部家训中说了什么？从中可以看出他什么样的官品与官德？让我们掀开尘封的历史，走进这部家训：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叙，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这部家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的虞朝和夏代便宣扬了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难道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要继续做太史，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

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因病不能随行，这就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期望撰写的愿望。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立身扬名。扬名后世使父母显耀，这是最大的孝道。”

天下都在称道周公，说他能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召公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周文王之父）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族始祖）。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齐、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都以此作为准则。

自春秋末期孔子作《春秋》起笔以来，到现在已经400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对这些人士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里上啊！”

司马谈的谆谆教诲，情真意切。他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并认为这就是“大孝”。他说自孔子死后的400余年间，诸侯兼并，史书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记录品鉴的职责，内心感到十分惶惶不安，所以他期待儿子司马迁能完成他的未竟大业。

从这篇《命子迁》，可以看到司马谈的两大品行：第一，忠诚于国家的史学事业。司马谈学富五车，所以他后来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掌管天之星历，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个职位是武帝为司马谈“量身定制”的。因此，司马谈对武帝感恩戴德又尽职尽责。

由于责任心极强，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海内心地说了上面那些话。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安慰父亲说：儿子虽然缺乏才能，但一定会尽心尽力完成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所要完成的父亲的遗愿，就是写作《史记》。他决意要使这部史书能够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后世”。3年后，司马迁果然担任了太史令，他利用国家的藏书，开始撰写《史记》。

可是不久，李陵事件发生了。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李陵是因为寡不敌众而战败投降的，这触怒了汉武帝，他被投进了监狱。因没钱赎罪，他被判处了残

酷的“腐刑”。受刑之后，司马迁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剧烈痛苦，曾打算自杀。可是一想到父亲的遗愿，想到自己费尽心辛万苦搜集来的资料，他就觉得自己不能死，《史记》在等待他去完成。如果死去，修史中断，“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矣。”于是他鼓起勇气，拿起笔来，夜以继日地继续写作《史记》。

公元前91年，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来各代的史书，大都模仿《史记》的体裁。在文学上，它的成就和影响也很大。《史记》所载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成为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它的艺术手法，也成为许多文学家揣摩效法的榜样。

司马谈虽然未能动手撰写通史，但为《史记》的撰写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确立了部分论点。《史记》中的《刺客列传》《陈涉世家》《樊邓滕灌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郗世传》等多篇的“赞语”，司马迁就是直接引用了父亲司马谈的原文。

第二，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司马谈不仅是一位饱学之士，关心现实政治，对自己的史学事业十分忠诚，而且很重视对儿子司马迁的教育。司马迁在父亲的教导下从小就刻苦读书，“年十岁则诵古文”。为了让儿子能继承自己的史学事业，司马谈让司马迁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孔安国、董仲舒等人学习古代历史文献。

但是当时还没发明印刷术和纸张，书籍本来就少，又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仅留下的一些断简残篇，不但记载简略，而且不少事例还互相矛盾、真假难辨。司马谈就鼓励年轻的司马迁亲自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各地的地理风貌和风俗人情，观瞻历史遗迹，搜集书本上没有记载的逸闻轶事。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当时司马迁20岁，按照儒家的教诲，“父母在，不远游”，到远方旅行属于“不孝”的行为。古代交通又不很便利，孤身外出，危险很多。司马谈不但鼓励儿子远游，而且详细告诉他一路上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可能的线索，怎样才能搜集到可靠的材料。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出武关，经南阳，到江陵，然后渡江南下，到汨罗江边，凭吊诗人屈原的葬身之处。然后他又来到九嶷山，瞻仰了舜的葬身之地。再到庐山，考察大禹治水的遗迹。他到会稽，访禹穴，了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到姑苏拜访伍子胥的神祠。他过长江，到江阴，收集韩信的故。到曲阜，了解孔子的生平。他也看了刘邦的家乡沛县和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司马迁花了两三年，走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为后来撰写皇皇巨著《史记》搜集了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当时的跋涉中得到的磨炼，对他后来能够战胜人生道路上的巨大坎坷，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司马谈对司马迁的教育，除了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儿子之外，主要是激励儿子的事业心和为他提供“行万里路”的机会。这是最难得的，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资料，使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司马迁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求实精神，使他能够打破许多陈腐僵化的观念，敢于为陈胜、吴广立传，把他们放到和封建帝王平起平坐的位置上。

成大事业者而不遭遇挫折，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如果司马谈只让他的儿子有书本知识的储备，怕他年纪轻轻出门受苦，临终前没有再三叮嘱，司马迁也许不可能在那样的屈辱中坚持活下去；他也许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史记》也不一定能够写就；即便写成了，也未必能够写得好。司马迁不负父亲的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名垂青史。

司马谈教子，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传为千古佳话。真可谓，没有《命子迁》就没有后来司马迁的千古绝唱《史记》！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平“语”近人》思想解读嘉宾）

叶嘉莹先生入选

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

2月17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入选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叶嘉莹先生的颁奖词是：“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情牵华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新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后人。”在颁奖典礼现场视频连线中，叶先生吟诵了她第一次回国讲学时写下的七言绝

句：“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先生表示，自己正在计划完成的一项工作，即把中国古代“诗、文、词、曲”文学创作的吟诵的声音传承下去，把我们民族美好的文化传承下去。（韵文）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勾勒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美誉，服饰不仅是人民生活的必要用品，也是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近日，“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数千年来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历程不仅折射出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的发展轨迹，也勾勒出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生活画卷。

据悉，此次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首个服饰通史类展览，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服饰形制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服饰文化。国家博物馆藏有丰富的古代服饰相关文物，沈从文、孙机诸先生先后在服饰考古、服饰史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研究方面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本次展览就是以孙机先生等博学者数十年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托，按历史时期分为“先秦服饰”“秦汉魏晋南北朝服饰”“隋唐五代服饰”“宋辽金西夏元服饰”“明代服饰”“清代服饰”六个部分，展出文物近130件（套），类型涵盖玉石器、骨器、陶俑、服装、金银配饰和书画作品等，